

发挥出愈来愈大的功效，与汉唐时期的农业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内陆国家转变为海洋国家，其实质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为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发展为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演变为生产交换价值，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

以上种种历史变化表明，两宋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依仗其特有的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经济发展道路，亦即打破传统单一种植经济的束缚，合理、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进行多种经营，大力发展茶叶、蚕桑、花果、竹木等经济作物种植以及纺织、造纸、制瓷等手工业生产，尽可能地拓展国内区域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力图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以寻求最大经济效益。

以上所述，即是我对唐宋经济变革的主要看法。在历史学人的视野中，重视变化无疑是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亦唯有如此，方可厘清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世态人心的迁转移幻，进而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终体现史学的镜鉴功能。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假说”，体现了对历史变化与长时段研究的重视。但应看到，此后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推进，亦有贡献。对于“唐宋变革假说”，中国学者经历了一个从学术自发到学术自觉的认识历程。最初阶段是唐宋史贯通研究思路的萌发阶段，大致可从1903年梁启超等人为新史学奠基算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先是伴随着近代中国史学筚路蓝缕的拓展，学界逐渐摒弃以朝代的更替为断代史研究圭臬的传统思路，开始以长时段、贯通的眼光对中国古代史重新进行分期。1954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敏锐地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随后，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前述胡如雷、蒙文通、漆侠、张邦炜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使中国大陆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范式，最终也带动了国内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有李华瑞组织部分中日学者共同撰写的《“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②作过详细介绍，可以参阅。

长时段视阈下的唐宋变革

——从隋代对唐宋的直接影响说起*

魏明孔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在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学术研究中，唐宋变革无疑是一个自20世纪前期至今方兴未艾的话题之

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后收于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6页。

② 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隋代经济史研究”(13A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一，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①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宋变革论”作了一些肤浅思考，荒谬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唐宋变革：一个常识还是真正的变革规律

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②五百年只是个概数，意味着历史进入到一定的时段，即500年左右的时间，会出现社会变革或高潮，并且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节点。这是孟子对其所处的历史以及以前历史规律的一个总结。应该说，孟子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深远，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唐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其时间是600余年，属于孟子所言之范畴内。在我国史书记载及当下学术界的论述中，已经将唐宋连称成为一个事实。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则突破了这一窠臼“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③

马端临总结了从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到唐代杨炎的变化，一是立足于土地及其变化——经济基础；二是传统社会的两个巨变节点；三是突破了500年一变的窠臼——千年一变——更长时段、更大背景下对我国社会历史的总结。马端临对我国历史上两个关键人物商鞅和杨炎的重视，正说明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的重要性。商鞅变法的结果是导致了秦国对战国局面的终结并形成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而杨炎在唐德宗支持下于建中元年(780)所主持实施的两税法，则是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里程碑。或者说，马端临关注的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确立以及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这两个关键点，这是真正看出了历史的本质，反映了历史的规律。

唐宋变革，似乎只是反映一个历史时段的基本变化，而非变革规律。从马端临之说到陈寅恪、金宝祥等先生坚持的“中唐变革论”，则更能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

二、唐宋，渐变的历史还是突变的历史？

我国历史从整体上看是一个渐变为主且有一定突变的历史，如果我们任意裁断我国历史上的500年，均有比较大的变化，几乎没有例外。不管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还是明清时期，都与唐宋时期一样，可以找出其变革的事件以及标志性人物。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唐宋变革^④确实是一个学术发现，而要将其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例，则显得理由不充分。如果说唐宋变革是一个伪命题可能有失于苛刻，系老生常谈或常识却是史实。而这样的一个常识性问题，为何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巨大？新中国成立后与外界的长期隔离，改革开放后开始对于国外学术观点的新鲜感，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隋代对唐宋的直接和深远影响

如果唐宋变革存在的话，对其产生直接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只有38年历史的隋代，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下面几点便能说明问题：

隋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张掖互市。大业五年(609)，在张掖(今属甘肃河西地区)举行

① 参见李华瑞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

② 《孟子》卷四《公孙丑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6页。

③ (宋)马端临 《文献通考·自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④ [日]内藤湖南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1922年。

了由27国的国王及使节参加的互市,将隋代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使隋唐的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以张掖为中心的对外开放的窗口被确立,意味着陆路丝绸之路第二次高潮的到来,也显示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提高。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被少数民族及一些外国首领、使节尊称为“圣人可汗”,^①而后来唐太宗被称之为“天可汗”,^②实际上是对隋炀帝时期“圣人可汗”的认同,或者说是另外一种表达形式而已。与此同时,如日本的“遣唐使”,只不过是“遣隋使”的追随者而已。隋代派遣重臣裴矩多年在河西地区深入访问、调研后写成的《西域图记》,^③后来也成为唐代治理西域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依据。

隋炀帝多次巡视扬州,客观上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同时也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唐代“扬一益二”,其开端当始于隋代。“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④只是作为具有诗人气质的隋炀帝的一种文学表述,并非实际的写照。全汉昇先生强调,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将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以便因内在的坚强凝结而生出力量”。他进一步指出,“运河自隋代开凿后,与唐宋帝国势运的盛衰消长,着实是非常密切的”。^⑤唐代中后期完成的经济重心的转移,无疑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事件,南宋能够在南方立国多年,当与此不无关系。^⑥

隋代在政治制度上确定了三省六部的雏形,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影响了唐宋社会。隋初即实行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制,三省长官同为宰相,这种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的权力,同时对皇权也有一定的限制。《隋书》卷七五《刘炫传》:“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⑦旨在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隋代三省之间既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同时也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三署合之为—,分之—。隋代的中央机构的制度设计,较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显得更加成熟和完善,唐宋继承隋制,使得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同时弱化了地方势力。隋代结束了魏晋以来的战乱兵燹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度,为以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历史上自东汉末年出现战乱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虽然期间出现过西晋这样的统一王朝,但是由于出现分裂割据的基础没有改变,实际上这种统一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而隋代建立之初,即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权力、防止地方分裂割据的举措。其中隋代对于地方行政的设置及官吏的任用,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唐宋乃至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指出的“隋以后之刺史,犹今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也”。^⑧

隋代确定了唐宋及其以后文官制度的内核——科举取士(进士科),持续时间长达1300年之久。隋代采取设置进士科等措施,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九品官人法的否定,从此“选举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⑨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对官吏的选举与任命权。隋代设立科举制的创新之处,在于科举考试具有扩大人才来源,给考生尤其社会下层考生以相对公平的机会,激励了社会竞争机制,促使国家政权的开放,促使文化下移等。宋真宗所言“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⑩反映的正是唐宋时期士子对于科举考试的热衷。与此同时,隋代重视文化建设是不争之史实,其中如隋炀帝从作为王直至当上皇帝后,修撰包括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等书籍,“无不精洽”,共31部、17000余卷。不仅如此,炀帝还将传统书籍进行校勘整理,抄写五十副本,分别置于西京、东都的宫殿及各部门。这有利于

① 《隋书》卷八四《西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79页。

② (宋)王溥《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4页。

③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8-1580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炀帝大业十二年(616)七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05页。

⑤ 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册《唐宋帝国与运河》,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第393-394页。

⑥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⑦ 《隋书》卷七五《刘炫传》,第1721页。

⑧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隋以后刺史》,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23页。

⑨ (唐)杜佑《通典》卷一七《选举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页。

⑩ (宋)胡澹庵《绘图解人颐》卷一《劝学诗》,上海海左书局民国三年(1914)版。

文化的传承,唐宋以文立国,发展文化教育,均与此一脉相承。^①

隋代实行的“轻税之法”,为唐宋税收政策所继承。隋代统一全国后,在高颀的主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轻税之法,史称“高颀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②唐宋的两税法基本内容和方向与此相一致。前面所讲的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由杨炎主持进行的两税法,实际上是隋代开皇十八年(598)“计户征税”^③的继续与深化,或者说是与唐代实行的两税法一脉相承。^④与此同时,这种情况对于宋代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⑤

隋代大修运河,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格局,同时也确立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与经济重心南移之态势。隋代在历史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开凿南北运河,其中包括隋文帝时所开通的广通渠,隋炀帝时开凿的通济渠、永济渠等。关于隋代运河对后代的影响,唐代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写道“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辘轳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⑥隋代的运河、仓储,成为唐代的经济遗产,对于宋代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及其完成,运河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低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自隋代形成网络后,便成为我国历史上南北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和经济生命线,唐宋的经济发展与此密不可分。

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多次攻打高句丽,具有深刻的原因,并对唐宋社会影响深远。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接二连三地攻打高句丽,以至于国力受到严重影响,即是说隋代短命而亡也与此不无关系。唐太宗、唐高宗同样多次攻打高句丽。以千古明君著称的唐太宗,却与其继承人唐高宗同样多次攻打高句丽,其中的缘由到底为何?金宝祥先生通过研究认为,北方游牧民族鉴于中原王朝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充,处心积虑地形成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北边的强大弧形包围圈。若不打破这个弧线包围圈,便难能有中原王朝的北方安定。^⑦尽管唐太宗君臣“以隋为鉴”为既定方略,不汲取隋代的前车之鉴,可见对于隋代攻打高句丽意义的认同。

四、简单结论

通过上面的简略叙述与分析,我们认为对唐宋变革论的评价,无疑涉及对历史上社会变革的长时段视角、对一般规律与特殊现象的认知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与消化等诸多问题。李剑农先生强调,“隋之统一,实为由中古前期转入后期之枢纽”,^⑧诚哉是言!通过对唐宋变革论的简单梳理,尤其对隋代对唐宋社会的诸多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隋代对于唐宋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活习俗乃至制度各个方面。

2. 唐宋变革,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变化而已,难能成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事件。相对而言,隋代对于唐宋的影响是深远和直接的。在这一方面,“中唐革命论”较“唐宋变革”论更能反映社会变化的实质。

3. 就唐宋变革概念的提出,似乎有就唐宋讨论唐宋之嫌,没有将其纳入长时段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实际上没有逃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窠臼。

责任编辑:孙久龙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615)正月条,第5694-5695页。

② (唐)杜佑《通典》卷七《食货典七》,第42页。

③ (唐)杜佑《通典》卷五《食货典五》,第31页。

④ 参见金宝祥等《隋史新探》第一章《隋史总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2页。

⑤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一章《宋元明总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

⑥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⑦ 金宝祥等《隋史新探·序言》,第2-3页。

⑧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第八章《隋唐总叙》,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2页。

主持人语（李华瑞）：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地域格局、政治态势、社会结构，还是文学艺术、经学思想等诸方面所发生的迥然变异，令后世举目、今人寻味，也引起海内外中国史学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假说到欧美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说、宋代经济革命说，再到近年来的宋元变革论、唐宋会通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唐宋变革认识论等，以唐宋变革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始终未曾落下帷幕。正是在这样诸说纷纭、各为己见的境况下，史学研究者更应以贯通、融会的历史大局观来探究唐宋之际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剖析唐宋变革学说在国内外的不同学术发展路径。以下几位先生正是秉承着理性、求是、本真、严谨的史学态度对唐宋变革乃至更早并与之相关的魏晋隋唐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以期进一步阐释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认知、客观呈现唐宋历史的真实面相。

体系意识：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

张邦炜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一、从问题与体系宜并重说起

常言道“牵牛要牵牛鼻子。”做学问如何牵住“牛鼻子”？而今学界往往问题意识强调较多，体系意识说得较少。更有甚者，机械地把学者划分为“做问题”的和“做体系”的两种类型，一味赞扬前者、贬低后者。凡事都应问个为什么，乃至打破砂锅问到底。做学问无非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难点在于发现问题，如能较准确地提出真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一大半。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愚见以为，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同样重要，不宜顾此失彼，赞此贬彼。

所谓体系，简而言之，是不同系统组成的系统，是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体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体观、全局感是近义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应当对全局具有总体观察、全面把握、系统分析的能力。体系与问题的关系，近乎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并不对立，不仅兼容，而且互补互济互动。琐碎与空疏是学人治学应该防止的两种偏向。体系意识不仅有助于发现、深化问题，而且可避免选题无关宏旨，凡事必录必究，细大不捐，以致捡了芝麻，丢掉西瓜，流于零碎化。而问题意识不仅有助于充实、修正体系，而且可避免选题大而无当，急于建构体系，以致空洞无物，缺乏说服力，流于概念化。体系意识与问题意识互动，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研究不断深化、细化。

胡如雷先生曾说“以小见大，陈寅恪之谓也；以大见小，吕思勉之谓也。”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小”是指较为具体的问题，而“大”则是指较为抽象的体系。陈、吕两大家为我们树立了“大”“小”并重，体系与问题两种意识相结合的典范。吕思勉着眼于“大”，其学术旨趣是说明中国社会

收稿日期：2016-01-25

作者简介：张邦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葛金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经济史；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古史、中国传统经济史。